

大哲人之一
王国维 (1877—1927)
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匠，国学大师。我国史学

章太炎 (1869—1938)
初名学乘，字枚叔，号太炎，后改名为炳麟，浙江余杭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后又遭

钱穆 (1894—1990)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权，子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秦振，周子尔，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

钱锺书 (1910—1998)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

黄侃 (1893—1935)
初名吴鼎，后更名吴赞，号黄侃，湖北武昌人，

傅斯年 (1896—1954)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古史

李达 (1895—1968)
字鹤年，湖南长沙人，中国现代著名

李卓如 (1866—1928)
字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张荫麟 (1900—1953)
字季氏，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古史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中国现代史学

钱宾四 (1894—1990)
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史大师

钱穆 (1894—1990)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权，子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秦振，周子尔，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

钱穆 (1894—1990)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权，子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秦振，周子尔，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

王易中国词曲史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



吉林人民出版社

百五十一之一 梁启超 (1873—1929)

梁启超 (1873—1929)
中国近代史学

梁启超 (1873—1929)
中国近代史学

梁启超 (1873—1929)
中国近代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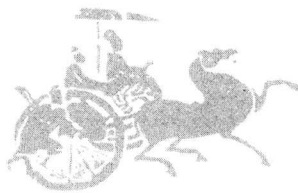
梁启超 (1873—1929)
中国近代史学

梁启超 (1873—1929)
中国近代史学

梁启超 (1873—1929)
中国近代史学

梁启超 (1873—1929)
中国近代史学

梁启超 (1873—1929)
中国近代史学



王
易
中
国
词
曲
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易中国词曲史 / 王易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1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
ISBN 978-7-206-08279-5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词曲史—中国—古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6274号

王易中国词曲史

著 者:王 易
责任编辑:李艳萍 王 静
制 作: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4.5 字 数:32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8279-5
版 次: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一、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旨在为读者提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来的中国学术精品。当时，学问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学术革新；因时应势而现出版高峰，大师名家之作数量激增；质量上乘，对此时及后世的中国学术发展与演进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本丛书精选此时大师名家之有关学术文化经典著作，以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做一系统整理。

三、丛书所收书目，虽各自早有出版，但零散而不成规模。此次结集，欲为推动中华文化之大发展、大繁荣尽出版人绵薄之力，成一民族文化珍品，为后代留存传之久远的鸿篇巨作。

四、为丛书系列之计，故以史学、国学、文学、一般学术著作之顺序编排。

1. 单种书文字量过少的著作，寻二三种内容相近，或作者为同一名家者，则合成一册，字数以30万字为限；

2.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50万字的著作，则分为上、下两册；

3.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100万字的著作，则分为上、中、下三册。

五、所收著作，版本不一；流布之中，文字错讹；择其善本，一一折校。现虽为通行横排简体，然尽量保持二三十年代原貌。

1. 人名、地名、异体、通假，仍从原书繁体；

2. 标点符号，从作者习惯，非排版差误者不予改动；
3. “的”，“底”一类文字之分，均从原书；
4. 遇原书字句有疑问者，非有根据不予更改，力求保持原貌。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丛书，工程浩大、环节繁多，编辑、校对、照排、印制人员虽勉力为之然错漏不免，还望方家谅解之余不吝指正。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编委会

主 编：

胡维革（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 委：

赵 毅（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书源（吉林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舒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信君（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执行编委：

杨九屹（吉林人民出版社 编审）

总 序

：

在几十年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史颇感兴趣。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6年我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杜文君老师一起撰著《中国现代文化志》一书时，更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由此，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尤其是那些文化泰斗、学术大师、扛鼎巨著、思想流派、异说纷争等，更令我铭刻在心，萦绕于怀。直到今天，每每回想起那段英英厉厉、千唱万和的历史，仍然是激动不已。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者标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间38年，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阐扬；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体系在变革，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出版了近十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出类拔萃之作；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了近五百万名学生，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科学

家，等等。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结构、性质、内容和特征。“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近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纵观20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成为新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自由、平等服务。这时，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在领导文化变革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华民族“讲话”、“呐喊”的思想家。可是，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始终未能彻底完成。“五四”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为

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

其基本态势是：其一，“五四”以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时期，与此相应，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仍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以传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以介绍和品评西方文化、重释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并以文化为武器来推动社会改革、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为根本目的。其主要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化各领域、各门学科的变革与发展上，而且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应用以及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上。其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派别林立论战迭起的复杂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论争有：东西文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等，这是当时多种社会经济与复杂阶级关系、民族矛盾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多种思想源流汇集于中国社会的必然表现。其三，就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趋势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新文化营垒的一翼，继续发挥反帝反封建、推进社会前进的作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旧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

具体到各个学科，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学术大家在辛勤耕耘，都有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面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构起来的。例如在历史学学科，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谷诚的《中国通史》，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

《中国通史》，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1948年新知书局出版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诚的《世界通史》，1936年南京文化印刷社出版了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源澄的《秦汉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三国史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毓黻的《宋辽金史》，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孟森的《清史讲义》，1947年新华晋绥分店出版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等等。这些学术巨匠和学术巨作，使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了。其他学科如哲学、文学、教育学、民俗学、法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等，也是如此。学术史是全息。后来者应该探源开流，继往创新，把我国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组织同仁历时数载，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以飨读者。

是为序。

胡维第

2011年12月15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序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家分隶屈原，陆贾，荀卿，并杂赋为四。屈主抒情；陆主说辞；荀主效物；杂则诸谏之属也。歌诗则次吴，楚，燕，代，邯郸等以当风；次汉兴兵所诛灭，出行巡狩等以当雅；次宗庙送迎灵颂以当颂。其《李夫人》，《幸贵人》，《中山孺子妾》，《未央才人》，《黄门倡》等，则剧本之类也；《周秦》等则前代乐章也；《谣歌》，《诗声曲折》等则歌声谱式也。刘《略》，班《志》，实开文章派别之先声，亦即谈艺家所自昉。《法言》，《论衡》，片辞居要。至魏文《典论》，肇著专篇。自后作者如《文章流别论》，《文章缘起》，实详体制；《诗品》，《翰林论》，《文赋》，品藻利病，多甘苦之言；刘勰《文心雕龙》，责实课虚，网罗前世，截断众流，叹观止矣！《楚辞》，《百官箴》，《七林》，《连珠集》，《玉台新咏集》，义专论品，总集斯兴；至昭明太子《文选》，屹然为艺海大宗！爰逮唐宋，体制渐歧，各明一义。征文考献，论世知人，则有《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范》，《金文雅》，《元文类》，《明文衡》，《历朝文纪》，《古诗纪》，《全唐诗》，《全五代诗》，《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全金诗》，《元诗选》，《明诗综》，《列朝诗集》，《全唐文纪事》，《历朝诗纪事》，《广陵诗事》，《感旧集》，《篋衍集》，《湖海文传》，《诗传》，《诗人征略》，《琬琰集》，《碑传集》之属，托体独尊，文也，而史寓焉。析体制，则《文章襟喉》，《文章辨体》，《文体

明辨》等尚焉；谈义法，则《修辞鉴衡》，《四六法海》，《瀛奎律髓》，《唐诗鼓吹》，《古文绪论》，《唐音》，《唐诗品汇》，《艺苑卮言》，《谈艺录》，《说诗晬语》等备焉。明派别，则有《江西诗社宗派图录》；标句法，则有《主客图》；讲声调，则有《谈龙录》，《声调三谱》。泊夫析赏考证，巨细兼赅，则有诸家《诗话》，《四六话》，《四六谈尘》，《赋话》，《读赋卮言》，《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丹铅总录》，《诗薮》，《然灯纪闻》之属，郁郁乎！彬彬乎！八音繁会，五采相宣已。然求其贯今古，穷源委，析利害，究正变，足与《文心雕龙》媲烈者，史家惟有《史通》而已。诗文大国，既如此矣。词曲导源既晚，托体甚卑，论盖尤鲜。如《中州乐府》，《历朝词综》，《昭代词选》，《词林纪事》，《本事词》，《篋中词》之属，则以征文考献论世知人为归；而《乐府补题》，社稿也，《元草堂诗余》，总集也，黍离麦秀之哀寓焉。如《遏云》，《家宴》，《尊前》，《花间》，《兰畹》，《金奁》诸集，《草堂诗余》，则以嘌唱为宗，间明宫调；如《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花庵绝妙词选》，《绝妙好词》，《花草粹编》等，则专示准绳，或搜遗佚。如《荆溪词》，《众香集》，《宫闺词》，《闽词钞》，《西泠词萃》，《湖州词征》，《甬上近体乐府》，《常州词录》，《浙西六家词》，《明湖四客词》，《闺秀词汇刊》之属，或断代，或限地，或限人，间阐宗风。专咏一物，则有《梅苑》，《梅词》，《萍聚词》；专用一调，则有《龟峰词》，《百萼红词》，《聚红词》，《友声集》，《碧濯词》；析源流，则有《教坊记》，《乐府杂录》，《碧鸡漫志》；正宫律，示义法，则有《词源》，《乐府指迷》，《作词五要》；析派别，则有《词辨》，《宋四家词选》；标句法，则有《词旨》；订声律，则有《圈法美成词》，而后来诸家《图谱》，钦定《词曲谱》，由此出焉。万氏《词律》，擅廓清复古之功；《天籁轩词谱》，独标雅正；谢氏《碎金词谱》，旁注工尺，取自九宫南词，意仿白石歌曲，施之弦管，尚隔一尘。论音韵，则有《棗斐轩词林韵释》，学宋斋，榕园，沈，毛，仲各家《词韵》，尚属椎轮；

而谢氏《碎金词韵》，依黄公绍《韵会举要》，备注五音清浊，戈氏《词林正韵》，《晚翠轩词韵》，一依《集韵》，一依《佩文韵》，折衷古今，足何据依；《菴斐轩》虽最称古本，实同曲韵，非词家所适用。下逮诸家《词话》，《词品》，《词统》，《词筌》，《词衷》，《词尘》，《词苑丛谈》之属，巨细兼明，凡诗文家所有箸述，词苑咸备焉。论曲之书，不逮词家之繁，实较词家为密。如《太和正音谱》，《南九宫谱》，《北词广正谱》，《金元十五调》，《骷髅格》，《南音三籁》，《啸余谱》，《南词定律》，《钦定九宫大成谱》等，则图谱之属也；如《中原音韵》，《中州音韵》，《洪武正韵》等，则音韵之属也；如《碧鸡漫志》，《武林旧事》，《梦粱录》，《辍耕录》，《野获编》等，不专论曲，而沿革具焉。钟氏《录鬼簿》，为元曲箸录专书；臧氏《元曲选》，为剧曲总汇，杨氏《太平乐府》，《阳春白雪》，则散曲存焉。而黄氏《曲海》，王氏《曲目》，为曲家别辟目录一途。他如涵虚子《曲论》，《词品》，丹丘先生《论曲》，王氏魏氏《曲律》，沈氏《衡曲尘谈》，《顾曲杂言》，《度曲须知》，徐氏《南词叙录》，吕氏《曲品》，高氏《新传奇品》，梁氏李氏《曲话》，焦氏《剧说》，徐氏《乐府传声》，则杂论南北曲之声韵义法作家。《盛明杂剧》三编，汲古阁刊《六十种曲》，墨憨斋《传奇定本》，则南曲总汇；《雍熙乐府》，又为北曲南曲之总汇；《缀白裘》则杂选南北曲，允推巨编也。综览吾国二千年来谈艺之作大概如右所举。其能以科学之成规，本史家之观察，具系统，明分数，整齐而剖解之，牢笼万有，兼师众长，为精密之研究，忠实之讨论，平正之判断，俾学者读此一编，靡不宣究，为谈艺家别开生面者，阒无闻焉。南昌王子简庵，十年来倚声摯友也。去年教授心远大学，撰《词曲史》一编，用作教程。盖感于废学新潮，群言淆乱，深愍晚学无所折衷，将以祈向国学之光大，牖启来者，导之优美高尚纯洁要眇之域焉。盖词曲之为体，忠厚恻怛，閼约深美，史公所谓隐约以遂志者，有恻隐古诗之义；足以移人性灵，愉人魂魄；冀得匡拂末流，涵濡德性，而反

之于诗教也。方南昌乱亟，吾二人者，皆闭门论箸，数有切磋，愧少弘益。今将远别，督序于余。特历举吾国古来谈艺之著述，品论扬榷，俾读者知此编位置所在云尔！丁卯六月威远周岸登。

例 言

文学全史，体大绪繁。词曲一隅，范围固隘；然与乐府，同源殊体。是编尚论乐府流变，冀探其源；详述词曲演化，务明其体。

史家体例，本重叙述，间入议论，左马已先。是篇叙述往迹，时参目论；篇首引端，义同序赞。

篇章之区，各以时代篇题浑括，用摄其纲；章题显明，以张其目。

词盛于宋；曲盛于元。叙词详宋；叙曲详元。明曲胜词，曲详词略；清词胜曲，曲略词详。

体制为本，不厌求详；作者为迹，未免于略。

词体简约，例可系人；曲篇繁重，例惟示始。

史称载笔文叙为宜；文所难明，佐以表列。避档册之琐屑，蕲览诵之清通。

称引前说，或著或略。语待折衷，则标所自出；事无歧隐，则视若公言。直举所知，无意掠美。

句读符识，习见近籍，从俗援用，以利后生。

载籍无涯，闻见有限。取裁率尔，无漏为艰。补阙订讹，有待贤哲。

导 言

东西诸国，文化各殊，溯其渊源，每由民族质性之有偏，居处环境之互异，用是演进，各展所长，经时既遥，遂歧趋尚。西方种糅国密，待竞而存，生生所资，无敢暇逸，理智所注，科学兴焉；中华地大物博，闭关自足，历岁数千，同文一贯，情感所凝，文学尚焉。夫文学公物也，亦文化之果也，有文化者即有文学，宁独中国？虽然，事有偏胜，物有特征。文学者，中国所偏胜而数千年所遗之特征也。西国未尝无文学，而历世未若中国之久，修养未若中国之深，好之者未若中国之多且专，此无可逊也。然则吾人姑谓中国文学甲于坤舆，殆非过矣！

虽然，国人之瘠于文学也亦甚矣！自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迄于清，举凡文士才人所毕生萃精力而为之者，何莫非文学哉？其为类也，有散，有骈，有韵律；其为体也，有文，有赋，有诗词歌曲。任举一端，皆足耗其人半生心血以求一当。则妨生事，阻普化，非文学之本意也。然而业无幸成，功无虚牝，力之所及，效则致焉。苟时方丧乱，尚申、商之法，右孙、吴之谋，用苏、张之策，抑文黜学驱民以归于惨澹苟营之涂，斯已矣；如其不然，欲养和平康乐之风，存温柔敦厚之教，使心声所播，文采所敷，濡染弥漫，蔚成国华，则艺不厌精，心无求暇。盖文章政事，分道扬镳，纵未兼长，无妨并进。使持功利之见，杂诸性情之间，行见顾忌迁就，无有已时，而支绌隳落，可立待矣。故恶高美之文学者，不必言文

学，揭简易以为倡者，不足言文学。

所谓文学之优劣，果以何为标准乎？征诸中西论文者之语。可以睹矣。西方之论文，恒以读者之赏鉴为准，其重在外缘；中国之论文，则以文章之本质为准，其重在内美。波斯奈谓“文学志在取悦于大多数人”；而杜甫乃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赫德森谓“文学论情述理，对大多数人类生兴趣”；而昭明太子乃云“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梁元帝更云“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察其所揭之帜。则其内外轻重之不同明矣。故中国文学，惟务充内美，而不计外缘，其得在高超，而失在不普；西方文学，务容悦当时，趋附风尚，其利在广被，而弊在委随。此亦中西人性之殊。而文学根本之歧点也。

文章之内美，约四端焉：曰理境也，情趣也，此美之托于神者也；曰格律也，声调也，此美之托于形者也。托于神者，为一切文体所同需，托于形者，则诗词曲所特重也。理境高矣，情趣丰矣，无格律声调以调节而佐达之。犹鸟兽之不被羽毛也，犹人体之不著冠服也，犹舞无容而乐无节也。虽自矜其精神之美，何济焉？《诗序》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沈约云：“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则格律声调之重，昔人固论之周已。

昔季札观乐，闻声而识其国风。《诗》三百篇，大率可被之弦管。故班固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夫声不谐则乐不叶，欲咏其声何由乎？故诗歌之与格律声调，源固并也。汉魏乐府，置协律之官；隋唐登歌，传坐立之伎。乐日盛矣。然太白《清平调》香山《杨柳枝》，本属绝诗，却开词脉。自时厥后，诗乐并兴。词则应运而生汇流而大。于是格律声调，尤重于诗歌矣。

或曰：词曲之事，亦仅于抒情而已，乃至侔色揣称，刻羽引商，词调数百。曲体千余，得无有玩物丧志之患乎？曰：人心情态，何啻万千！声